



Mingdai ruxue
de shisuhua yu minjian
wenhua xinli yanjiu

明代儒学

的世俗化与民间文化心理研究

——以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心

邱兴跃◎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Mingdai ruxue
de shisuhua yu minjian
wenhua xinli yanjiu

明代儒学

的世俗化与民间文化心理研究

——以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心

邱兴跃◎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代儒学的世俗化与民间文化心理研究: 以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心 / 邱兴跃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643-2292-2

I. ①明… II. ①邱… III. ①通俗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1580 号

明代儒学的世俗化与民间文化心理研究
——以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心

邱兴跃 著

责任编辑	郭发仔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 mm × 208 mm
印 张	8.5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292-2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儒学的世俗化与明代通俗小说之关系	21
第一节 儒学发展与基层社会儒学的推广	24
一、明朝的儒学政策及其影响	24
二、乡约制度使儒学得到推广	30
三、社学、讲学与儒学世俗化	34
第二节 阳明学的兴起与白话小说的教化	41
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	42
二、王阳明“尚俗”观对白话通俗小说的影响	48
三、白话通俗小说的教化与重情	53
第三节 通俗小说作者群体与小说的传播	57
一、明代科举政策及中下层文人生存空间的逼仄	58
二、白话通俗小说作者群体的淑世情怀	62
三、经史地位的衰微与白话通俗小说的传播	67
第三章 儒学观念在白话通俗小说中的演绎	73
第一节 为官之道：在修身与圆滑中生存	74
一、朝廷规定与现实状况	74
二、通俗小说中的官场现形	80
三、小说作者与读者对官吏的宽容	86

第二节 性爱观：一个始终绕不开的话题	89
一、性爱观与传统文本的规定	90
二、以《型世言》为例	97
三、以《欢喜冤家》为例	101
四、以“三言二拍”为例	107
第三节 孝道：无法缺失而又变态的存在	114
一、正史典籍与笔记资料中的孝	115
二、明代白话通俗小说家写孝道的动因考察	119
三、通俗小说文本中呈现的孝	124
第四节 女性观：守卫自己的爱情与幸福	128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观	129
二、两情相悦：明代通俗小说中婚姻观的嬗变	131
三、反叛与出逃：明代小说中的婚恋模式	137
第五节 善恶观：最为朴素简单的愿望	141
一、传统善恶观念的流变	142
二、明代白话通俗小说对善恶观的表现	145
三、善恶观念影响的故事结撰方式	149
第四章 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与民间文化心理	153
第一节 清官类：官制与民众期待的怪胎	155
一、清官情结产生的社会根源	156
二、“三言二拍”中的清官形象	161
三、《型世言》及其他作品中的清官形象	164
第二节 人君类：在真实与虚伪之间游走	168
一、仁厚而近虚伪的刘备	169
二、接受招降的孝义郎宋江	176

第三节 神魔类：满足老百姓内心的欲望	184
第四节 智能型：聪明多能妙算近乎神人	191
第五节 商人世界：仕途之外的精彩人生	200
一、明代商人大量出现的社会背景	200
二、明代通俗小说中的商人群体	206
第五章 通俗小说创作模式与民间文化心理	212
第一节 发迹变泰模式	213
一、发迹变泰模式的文化渊源	213
二、发迹变泰小说内容及常见的结撰方式	218
第二节 大团圆模式	224
一、大团圆模式的文化原因	224
二、大团圆模式在通俗小说中的普遍存在	229
第三节 类型化模式	237
一、类型化模式的原因探微	238
二、明代通俗小说中人物类型化塑造	241
结 语	247
参考文献	249
致 谢	265

第一章 导 论

源自先秦中原华夏文化传统的儒家之学，在西汉武帝时代获得朝廷独尊后，即成为历代王朝的主流价值系统，影响并渗透到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积淀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大的作用呢？陈寅恪先生曾从历史的观念作出如下解释：

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①

对此，余英时先生解释说：

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在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建制”一词则取其广义，上自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包括在内。凡此自上而下的一切建制之中则都贯注了儒家的原则。^②

对于儒学的巨大作用，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还这样说道：

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在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

① 陈寅恪：《审查报告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40。

②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77。

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常常听人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句话如果确有所指，则儒学决不能限于历代儒家经典中的教义，而必须包括接受儒家教义影响而形成的生活方式。^①

儒学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生活态度、人生信仰、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法、情感态度有着重大的影响，实际上起着某种宗教的作用。儒学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其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整套思想是古代传统社会人们，尤其是统治者阶层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的根本原则。张隆溪先生认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传统中国社会恰好是一个没有受任何宗教体系控制的社会，而且总的说来，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世俗性质。”^②

其实，儒学在古代，不仅是进德修业的君子之学，而且是一种宗教，儒家经典所载以天神地祇、人鬼三元系列神为膜拜对象的宗教祀典，不仅为历代王朝所尊奉，而且为民间社会所遵行。如祭祖的仪式等，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即明确称儒教是宗教^③，李泽厚先生则谓儒学是“半哲学半宗教”^④。谢谦先生认为：“儒教是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是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而孔子及其儒家则是传教者。”^⑤因而，儒学之为教，既是教化之教，也是宗教之教，故有“三教合一”的说法。宋代以前，儒家学者更关注的是通经致用，相对忽略对人心人性的探讨，较之佛道二教而言，人的精神世界几乎是儒学的盲点。宋代儒学开始转型，形成“理学”与“心学”等学派，冯友兰先生谓为“新儒学”。新儒学的特点，就是在坚守先秦儒学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汲取佛道二教的精神资源，对人心、人性等汉唐儒学的盲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建构起中国人对儒家传统价

①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54。

② 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77。

③ 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1。

④ 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5。

⑤ 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375。

值的普遍认同。这个转型过程，也是作为精英之学的儒学平民化、世俗化的过程。进入明代中后期，新儒学出现更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但这种世俗化倾向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儒学的正统地位；相反，这种转变通过受到过传统儒家思想浸染的文人之笔墨，投射到白话通俗小说之中，反而加速了其世俗化进程。换句话说，儒学基本观念通过白话通俗小说这种独特的形式，也恰恰扩大了儒学在民间社会的影响。

白话通俗小说是特定时代出现的和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小说的繁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契合了当时普通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反映了其观念愿望，满足了其情感与心理诉求。钱穆先生认为：“欲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当注意其风俗。”^①在明代中晚期，大批深受传统儒学浸染的文人冲破传统小说是“小道”观念的束缚，将创作白话通俗小说作为参与现实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以极大的热情编写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以满足世俗社会如饥似渴的娱乐需求，而这些小说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情感。通过阅读这些白话通俗小说，我们能了解明代社会中下层民众真实的生活状况，进而发掘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透过白话通俗小说，我们也可对明代社会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而这种认识很可能迥异于我们从当时精英文人所撰写的文本所得到的认识。陈来先生在《蒙学与世俗化儒家伦理》一文中说：

研究中国文化价值结构系统的方向有两种：一种是注重少数圣贤的经典中记载的理想的价值体系，另一种则完全注重一般民众生活和日常行为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对于历史学来说，后一种是不可能真正再现的。^②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当时反映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白话通俗小说来观照当时的社会生活。我们从白话通俗小说中，可以读到古代

①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1976：1。

② 袁行霈主编：《国学：多学科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4。

生活的另一面，这与从经、史、子、集中获得的中国文化印象有很大差异。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文本，并由此发现，儒家的思想意识与伦理道德尤其是程朱理学宣扬的那一套道德准则并非放之天下而皆准。至少，儒家的思想意识与伦理道德与古人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古代，“（社会下层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念虽然不能不受到官方倡导的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从来也没有和精英们保持一致”^①。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历史上所有成文的规定都是为了否定和约束人们的某种行为，它的反面可能具有很大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仅仅通过精英文本是不可能获得中国文化的全貌的。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和角度，以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心展开论述，意欲说明明代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其实有很大差别。一般民众的文化与心理就像静静沉淀的矿山，极为可贵，等待人们去开掘，并不因为精英思想的存在而渺然不存，而是真切地存在于民间社会。

这也就是葛兆光先生在考察中国思想史的脉络时，曾谈到一个对社会生活影响极大的概念，即“一般知识与思想”。他解释道：

“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的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②

并且，“这些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播并不在精英之间互相阅读、书信往来、共同讨论，而是通过各种最普遍的途径，比如观

① 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56。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4。

看娱乐性演出中的潜移默化（如宗教的仪式法会、商业集市中的戏剧说唱）、一般性教育中的直接指示（如私塾、小学、父母与亲友的教导对经典的世俗化演绎）、大众阅读（如小说、选本、善书以及口头文学）等等”^①，对整个社会及其生产、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深刻影响到文学创作者的思维方式、创作理念、创作手法诸多方面。而这些“一般的知识与思想”既源于儒家、佛教、道教等各派思想，又源于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等原始信仰。各种元素杂糅在一起，并行不悖，从而积淀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

所以，本书认为，对于以文学创作为主要生存之道的一部分明代知识分子而言，以艺术化的文学形象演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这就是将儒学世俗化。简单地说，儒学的世俗化就是儒学的通俗化、民间化。本书所探讨的是关于明代儒学的世俗化问题，即儒学所倡导的一些儒学基本观念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等如何渗透于基层社会，并获得其民间形态。本书探讨其在白话通俗小说中的具体形态，进而通过这样的分析了解明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及其文化心理。也就是说，明代白话通俗小说编纂与创作者们，其思想观念与普通民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普通民众或者与之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其实也是在一般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但同时，他们又可以通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或强化某种社会观念，这一点或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事实上，统治者推行的礼教或精英人士宣扬的儒家道德观念，与普通百姓实际生活中认同并遵行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朝廷表彰、正史记载、道德家宣扬的忠臣孝子、贞女烈妇等，是“道德楷模”，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尽管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钦定的主流话语，精英知识分子也不乏身体力行者，但民间社会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古代小说历来都有写实的特点，这应该是中国史文化传统在文学上的反映。中国文学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4。

自古注重“观风俗，知薄厚”的认识功能以及“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①的教化功能。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认识社会生活、世态人情，了解民众内心世界这一点上，白话通俗小说的价值也许远远超过精英文化所创造的各种文本。李时人先生在《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一文中就说：

作为人类成年的艺术，小说具有包罗万象的气魄，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可以说用美学方面写成的历史——“风俗史”和心灵史。与此必然相应的是，小说也是一种文化和文学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②

他还说：

在经济、政治与文学之间实际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中介”，那就是因经济、政治等作用而产生而的“思想文化”。而“思想文化”是有着多层次结构的，那些在特定经济、政治条件下群众精神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不稳定的情绪、感情、愿望、要求、风俗习惯、道德风尚、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是它的低级形态；系统的哲学理论、学术观念、政治思想、宗教义理等则是它的高级形态。如果我们从历史思想文化状况及其发展变化来考察文学，将会得到一些更深入的认识。^③

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说：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④

也就是说，小说作为一种表现社会生活的方式，从根本上说，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

② 李时人：《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文学评论》，1999（3）。

③ 李时人：《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与杂剧的繁盛》，《光明日报》，1985-12-31。

④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41。

它是古老的叙事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人物言行举止的链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绘，讲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反映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这样说道：“当人的行动被赋予形式，创造出一部艺术作品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形式就永远脱离不了人的意义，其中包括每当人们行动时就暗含于其中的道德判断。”^①

徐岱在其《小说形态学》一书中说：

小说不仅是一种艺术样式，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同诸如宗教、科学、道德、政治等具有联系，具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②

著名作家王蒙也认为：“文学常常能够相当集中、相当多方面地体现文化思潮和文化传统与文化心理。”^③

因此，就文本选择而言，我们要了解明代儒学思想观念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中下层民众真实的文化心理状况，就不应只关注精英知识分子所必读的《四书章句集注》、《明儒学案》以及明代朝廷颁布的一些官方规矩教条——这些专著及官方教条使儒学思想在民众中渗透固然是非常重要的，而更应关注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言二拍”、《型世言》、《欢喜冤家》、《西湖二集》、《石点头》等这样的白话通俗小说。这些作品为研究明代社会文化心理提供了形象的文本材料，因为这些明代白话通俗文学作品不单单是生活的记录，还反映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发展轨迹。勃兰兑斯就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

①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409。

② 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14。

③ 王蒙：《文学三元》，《文学评论》，1987（1）。

也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①

我们之所以要选择明代通俗小说作为研究儒学世俗化的对象，客观上说也是因为明代中晚明时期的小说与当时儒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殊性。首先，明代中晚期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是一个典型的动荡时期。但是，动荡时期也往往是产生新思想和最具有个性的时期。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呈现了空前的发展态势，反映普通市民的新思想也应运而生，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叛逆思想和个性解放思想对整个中晚明时期的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当时文艺领域中的主要革新家，如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等文学家，都恰好是李贽的朋友、学生或倾慕者，无不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其二，明代中晚时期又恰好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明代小说以世代累积型为主流，但同时也有大量诸如《型世言》、《欢喜冤家》、《西湖二集》、《石点头》这样优秀的文人独创型小说，从而呈现出时代累积型小说与文人独创型小说并存的局面。第三，明代中晚时期士人既受过传统思想文化教育，具有最浓厚的传统思想意识，又处于思想自由、个性突出的时代，再加上他们绝大多数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生活坎坷，物质贫乏，精神悒郁，所以，他们必然具有各种复杂的心情。夏咸淳总结了明代士人的心态历程：

明代士人心路曲折起伏，大致呈现出初期沉寂（袭宋而崇理）、中期振奋（慕古而尚气）、后期飞扬（趋俗而尊情）三种状态，与此相应，文学的发展则形成初期因袭、中期突破、后期超越三个阶段。^②

实际上，宋元以来也是中国世俗文艺勃兴的时期，以话本为底本的白话通俗小说崛起与兴盛于市井之间，作为民间说书艺术，它是向市场开放的艺术，是以听众为衣食父母的艺术，它比较充分地

①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

② 夏咸淳：《明代文人心态之律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显示了当时的民间心理和是非标准。特别是民间说书加工而成的白话通俗小说，其内容在历史上经过一个口舌相传的过程，承载着人们的思想和愿望，因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普通民众的一般心理状况与思想观念。可以这样说，不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型世言》、《欢喜冤家》、《西湖二集》、《石点头》等白话通俗小说作品，我们就不能深刻地了解宋、元、明三代中国的民间文化心理。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出儒家思想观念如何全面地渗进人们的头脑、血液，构建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思想世界与感情天地。从历史价值上看，这些白话通俗小说，也许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但正是它们某在程度上的“失真”，使它们具有极高的思想史价值。历史真实与这些小说的差异，恰恰体现出来的就是当时民间的一般思想——因为这些差异正是人们在口头相传中添加上去的。而正是这些一般思想，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及普通民众的心理。葛兆光先生就注意到了通俗小说在这些方面的重大意义：

小说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无意识流露的观念的文学表述，更值得思想家注意，如果一种观念常常在小说中无意地表达，并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来叙述，那么这一观念已经成了深入人心的传统。^①

作为研究阐释者，我们主要任务就是要揭示白话通俗小说写实与虚构背后所反映的民间心理和社会理想。并且，民间儒家思想的一系列基本观念，包括道德伦理观念等，虽然明显来自于官方提倡的儒家观念，但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样子。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分裂和紧张，一方面决定了儒家分化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民间儒家思想自有的一套迥异于官方正统的儒家价值评判系统。这些迥异于官方正统的儒家价值评判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就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儒学发展到明代，尤其是中晚明时期，已

①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它：六朝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42。

有非常明显世俗化的倾向，白话通俗小说的兴起，恰与儒学世俗化的趋势相呼应。白话通俗小说作者以形象化的手段演绎儒家思想，但可以明确地说，这种儒家思想已不全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是已经世俗化的儒家思想。本书试图以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心，着重揭示这些区别，从而掌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普通民众的文化心理是怎么样的，是如何受到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影响的。这对于我们探讨当代儒学的世俗化，即如何将传统的文化转化成为我们的精神资源，也许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明代白话通俗小说反映的也只是明代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并非全貌。但是，我们可以将其和其他方面的典籍材料进行对比印证，如当时大量较为客观的笔记小说、地方志以及同期的戏曲、文言小说等，还可以和明代正史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比，从而对儒学在这个社会存在的具体形态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此外，对本书涉及的一些问题略作说明。本书强调以白话通俗小说为主要材料，在对这些资料的考察中，希望在文化史的研究角度中进入小说世界中，进而掌握其中蕴涵的思想观念。并且，将小说中反映的思想观念纳入整个文化脉络中来考察，由此以探测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时代心理”、“社会文化心理”。当然，在这样的研究角度下，有一个前提性的假设——白话通俗小说是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的投影。而这样的前提之所以能够成立，必须要对这种普遍性做一个最基本的分析考察，即对白话通俗小说的流传广度做基本的考察，界定其在社会文化脉络中居于一种什么地位。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考察编纂者与读者两个方面入手。就编纂者而言，虽说文化史向度中的小说研究必须打破作者论，将作品从作者自己的创作理念中解放出来，但这只是指应将作品放在一个较大的角度来思考，而并非表示可以完全否定作者的存在意义及其对作品的影响。所以，创作者或编纂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创作编纂理念、诉求，还是应加以考虑，尤其是在考察作品在文化脉络中

的地位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关于作者，除了冯梦龙、凌蒙初、陆人龙、周清原等之外，还有不少作者难以弄清其实际情况，因为在当时创作白话通俗小说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很多作者都不会使用真实姓名。这些匿名的作者身份无从确定，可想而知其间必有不少的歧异性。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由其作品内容大体可以看出，这些作者在儒家精英文化方面应该都有某种程度的素养，而他们在写作这些小说时都继承话本小说的传统——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般群众为其设定的诉求对象，如冯梦龙《喻世明言·叙》中所言：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异为一刻。^①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冯梦龙编纂这些小说是出于对这种文化传播形式所具备的通俗性社会功能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之下，希望通过白话通俗小说与中下层民众沟通，借此感动普通民众，进而影响其行为。

凌蒙初的编纂理念是对冯梦龙的继承：

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②

①（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

②（明）凌蒙初：《拍案惊奇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